

马家窑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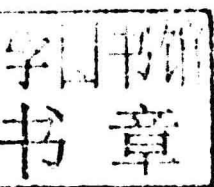
段小强

文物出版社



马家窑文化

段小强 编著



文物出版社

责任印制：陈 杰
责任编辑：王 伟
秦 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家窑文化/段小强编著.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010-3247-1

I. ①马… II. ①段… III. ①马家窑文化—研究
IV. ①K871.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7593号

马 家 窑 文 化

段小强 编著

*

文 物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http: //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燕秦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制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787×1092 1/16 印张：16.5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0-3247-1 定价：98.00元

序

杜斗城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特别是甘青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从1923年瑞典人安特生发现马家窑文化以来，关于甘青史前文化以及彩陶的研究，始终是中国考古学的热点之一。

多年以来，对马家窑文化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区系类型、发展序列及彩陶的纹饰、器形演变等问题上，而对马家窑文化在甘青地区独特地理环境下的生成与发展现状很少进行综合性分析。本书在系统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对马家窑文化研究进程及现状进行综合性评价。从考古发掘报告入手，对已发掘的马家窑文化遗址进行分类统计、分析，包括墓葬、居址，以及相关的随葬品、生活用具等，揭示马家窑文化对开启华夏文明所起到的促进作用。以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相互交叉的研究方法，从彩陶纹饰入手，研究马家窑文化时期原始文化中的图腾崇拜形式及宗教信仰，以及演变所反映的文化特质，尤其关注了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由游猎向农耕转变在图腾崇拜中的体现。从体质人类学、环境学、制陶工艺、金属冶炼等多角度对马家窑文化进行综合性分析评价，揭示马家窑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马家窑文化的渊源、特征及其发展道路充分证明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多源性以及马家窑文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所具有的重要地位。马家窑文化青铜器及刻划符号的发现，表明马家窑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处于很关键的时期。

我和本书作者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兰州大学我的家里。那是1991年7月暑期的一个午后，当时就读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本科专业的段小强怀揣其大学老师刘凤君先生（我北大同班同学）的引荐信来我家拜访，从此我们便有了二十多年的交往。1994年，段小强考取了我的硕士研究生，做的是有关敦煌丧葬礼仪方面的学位论文。研究生毕业后，他虽未在敦煌学上继续做下去，但在史前考古特别是马家窑文化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使我倍感欣慰。

我对段小强学术成果的“认识”是步步深化的。2005年12月，在甘肃省马家窑文化研究会与甘肃彩陶研究会共同举办的“中国彩陶马家窑文化研讨会”上，段小强“马家窑文化对中国史前考古的贡献”的发言，受到与会专家的重视与好评，初见其在马家窑文化研究方面的基本功力。也就是在这次学术会上，我还作过一个即席发言，其中心意思是：马家窑文化是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地带独立形成的一支新石器时代文化，创造这支文化的先民应是“羌人”的祖先。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地带的河湟流域应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其后《马家窑文化源流》编辑部一直要我把此次发言整理出来发表，但我感到许多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也就一直拖了下来。

2009年9月，为筹办在马家窑文化的命名地——甘肃临洮县召开的首届全国性“马家窑文化研讨会”，段小强与甘肃省马家窑文化研究会会长王志安先生共同主编出版《马家窑文化研究文集》（2009年9月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主要收录了安特生、夏鼐、苏秉琦、安志敏、裴文中、石兴邦、严文明、张学正、谢端琚、王仁湘、张朋川、郎树德、李怀顺等专家学者有关马家窑文化的著述，是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收录马家窑文化从发现至今研究成果的论文集，为研究此方面问题的同行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会议还邀请到了谢端琚、王仁湘、栾丰实、张朋川、郎树德、韩建业等考古学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对马家窑文化进行了深入研讨，并从研究现状出发，总结研究成果、规划研究前景，提升了马家窑文化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可以说，本次会议增进了甘肃省马家窑文化研究学者与国内知名专家的交流与合作。会后，段小强就向我表达了要编写一本有关马家窑文化研究著作的想法，我感觉到编写这样一部著作意义重大，故表示大力支持。

《马家窑文化》把多年研究成果和学术界最新论点介绍给了读者，是对马家窑文化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成果，它的出版发行，必将使更多的人了解马家窑文化，关注马家窑文化，热爱马家窑文化，研究马家窑文化！这也正是作者和我所期盼的。

近期，段小强想请我为其书写“序”，在看完初稿后，我感到段小强教授的这部书稿从编写体例到结构布局，从内容到形式都值得肯定，并有其独特创意，表明其写作此书是下了功夫的。作为国内第一部综合研究马家窑文化的著作，虽然书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还可进一步探讨、深化，但毕竟有了一个好的开端，故我乐意为之作序。

2011年5月18日于兰州大学杜撰斋

目 录

序	i
第一章 马家窑文化的发现、命名与研究	1
第一节 马家窑文化的发现	1
第二节 马家窑文化的命名	3
第三节 马家窑文化的普查与发掘	4
第四节 马家窑文化的研究历程	11
一 关于马家窑文化的渊源	11
二 关于马家窑文化的各类型	12
三 关于马家窑文化时期的社会发展阶段	13
四 关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纹饰	16
五 关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工艺与彩绘	18
六 关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收藏与鉴定	19
第二章 马家窑文化的分布、类型、分期与绝对年代	21
第一节 马家窑文化的分布	21
第二节 马家窑文化的类型	22
一 马家窑类型	22
二 半山类型	24
三 马厂类型	27
四 关于石岭下类型	30
第三节 马家窑文化的分期	32
一 安特生对马家窑文化的分期	32
二 中国考古学界对马家窑文化的分期	33

第四节 马家窑文化的绝对年代	36
第三章 马家窑文化的彩陶	40
第一节 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彩陶制作工艺	40
一 马家窑文化彩陶的制作工艺	41
二 马家窑文化彩陶颜料成分的研究	46
第二节 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彩陶器形和谱系	47
一 马家窑类型彩陶典型器形与谱系	48
二 半山类型彩陶典型器形与谱系	55
三 马厂类型彩陶典型器形与谱系	68
第三节 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彩陶纹饰谱系	78
一 马家窑类型彩陶花纹和谱系	78
二 半山类型彩陶花纹和谱系	91
三 马厂类型彩陶花纹和谱系	112
第四节 马家窑文化时期彩陶的多学科综合研究	124
一 黄河流域彩陶分布概况和特点	125
二 马家窑文化彩陶纹饰多学科研究综述	127
第四章 马家窑文化时期的经济生活	137
第一节 马家窑文化时期的自然环境	137
一 从气象资料看马家窑文化时期的自然环境	137
二 从动植物遗存看马家窑文化时期的自然环境	138
三 从彩陶纹饰和器形看马家窑文化时期的自然环境	139
四 自然环境的变化对马家窑文化的影响	140
第二节 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农业	142
一 粮食作物	142
二 农业工具	144
三 耕作方法	149
第三节 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家畜饲养业	150
第四节 马家窑文化时期的渔猎和采集业	153

一 渔猎业	153
二 狩猎业	154
三 采集业	155
第五节 马家窑文化时期的手工业	155
一 生产工具的制作	156
二 制陶业	161
三 纺织业	162
四 装饰品	164
 第五章 马家窑文化时期的社会状况	167
第一节 马家窑文化时期的房屋建筑	167
一 马家窑类型	168
二 半山类型	176
三 马厂类型	179
第二节 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墓葬	180
一 马家窑类型	180
二 半山类型	185
三 马厂类型	197
四 葬式葬俗所反映的文化意识	204
第三节 马家窑文化时期的青铜器	207
 第六章 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居民	209
第一节 马家窑文化时期的人骨特征	209
一 仰韶文化人骨总体特征	209
二 马家窑文化的人骨特征	210
第二节 马家窑文化辐射区与商时期戎羌活动区域	216
第三节 马家窑文化人面像遗物所反映的羌人习俗	219
一 马家窑文化前后各时期出土的人面像陶塑	219
二 马家窑文化人面像所反映的羌人“披发”、“剃面”习俗	220
第四节 马家窑文化葬俗中的戎羌特征	222

第七章 马家窑文化的渊源与发展去向	231
第一节 马家窑文化的渊源	231
一 马家窑文化中的仰韶文化因素	232
二 马家窑文化中的土著文化因素	236
三 马家窑文化中的东部文化因素	237
四 其他因素的影响	239
第二节 马家窑文化的发展去向	240
一 从地域分布来分析马家窑文化的发展去向	241
二 从考古学年代来分析马家窑文化的发展去向	241
三 从文化特征来分析马家窑文化的发展去向	243
后 记	249

第一章 马家窑文化的发现、命名与研究

马家窑文化是中国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遗址而得名。马家窑遗址虽发现较早，但以其命名却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对马家窑文化的命名，以及是否将半山、马厂类型包括在内，考古学界曾有过许多争议，到目前为止意见还没有完全统一。一般认为，它是仰韶文化晚期的一个地方分支，故又名甘肃仰韶文化。它上承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下接齐家文化。

第一节 马家窑文化的发现

20世纪初，田野考古对中国学者来说还是一门新的学科。中国也没有明确的石器时代遗迹。瑞典籍地质学家安特生（1874~1960年）是中国考古学的拓荒者，1914年，他应北洋政府的邀请，来华担任农商部矿政顾问，进入刚刚成立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主要负责寻找铁矿和煤矿。1916年袁世凯倒台后，局势混乱，地质调查因经费短缺而停滞，安特生转而专注于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1918年秋，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一批古生物化石以及“龙骨”，随后大批新石器时代工具被发现，使安特生坚信这一地区一定存在一个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存。1921年底，他对仰韶村进行了系统的勘测与发掘，这是中国也是亚洲第一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以不可辩驳的实物击破了西方考古界沿用的中国无石器时代的理论。随后安特生于1923年发表《中国远古之文化》，首次提出了“仰韶文化”的命名，并对仰韶文化的性质做了初步的阐述。仰韶文化的发现令安特生欣喜若狂，他深信可以找到比仰韶文化更早的古文化，认为中国更早的古文化应该在黄河上游。

1923年春，安特生带领地质调查所的中国助手，一起踏上了前往西北考古调查的道路。在西去兰州的路上发现了不少历史时期的文物，沿途还绘制了一些地形、地质图，如邠州泾河横断面图等。1923年6月21日抵达兰州，即沿湟水河谷向西宁出发。在西宁东的十里堡村冲沟壁上发现有灰层和彩陶片，认为是一处史前遗址。在当地政府

同意和支持下,对十里堡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不少石器、骨器和彩陶片等,并认为这是一处仰韶文化遗址,仰韶文化向西分布已达青藏高原的边缘^[1]。1923年8月至9月,安特生在贵德县发现罗汉堂遗址,该遗址位于黄河上游河谷地带,其地理位置在史前遗址的分布具有重要意义^[2]。1923年9月15日又于西宁以西发现并发掘朱家寨遗址。该遗址面积很大,分居住址和墓地,在墓地发掘43座墓葬,保存尚好,出土人骨43具及大量随葬器物。这是安特生除仰韶村外又一重大发现^[3]。

1923~1924年,安特生的甘肃、青海考古发掘获得了一系列的重大发现。1924年4月23日安特生一行由兰州出发,沿洮河南下,在今临洮县的洮河阶地上发现灰咀遗址和辛店遗址,在洮河西岸今广河县发现并发掘了齐家坪遗址,又在临洮县发现马家窑遗址。1924年6月26日于洮河西岸的和政县发现半山墓地,并发掘一座完整墓葬,该墓随葬品丰富,其中出彩陶8件。半山遗址是几处墓地和居住址的总称,包括瓦岗咀居址和墓地、半山、边家沟、王家沟墓地,彼此相距1~2公里,位于被冲沟切成的各个小山丘上,安特生发掘的墓地属于边家沟墓地。7月上旬,发现临洮县寺洼山遗址。为了探寻仰韶文化(半山)与辛店等青铜文化之间的缺环,其助手在民和县发现马厂塬遗址,发掘2座墓地,出土彩陶甚为典型。后安特生前往河西走廊调查,在民勤县发现了柳湖村、三角城及沙井村等遗址,对沙井村作了较大规模发掘,发现墓葬40多座,收获相当丰富。安特生在甘青地区两年期间,共发现50余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遗址。1925年在他回到瑞典后,他将这次工作成果整理成《甘肃考古记》,在中国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上发表。他将所发现的遗址分为六期,前三期为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是“新石器时代之末期,为新石器时代及铜器时代之过渡期”;后三期为辛店期、寺洼期、沙井期,是“紫铜时代及青铜时代之初期”。并认为“甘肃所出较多之彩色陶器,‘吾人亦不敢认为是真正中华民族之品’,‘彩色陶器之故乡,乃近东诸部’^[4],由此得出“中国文化西来说”的结论。安特生对中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有巨大的开创之功,但是他的分期与文化起源论是错误的。随后,尹达先生在《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中就提出“安特生对于各遗址年代的推测,自有重新估计的必要”^[5]。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夏鼐、裴文彬先生先后对甘青地区进行考古调查,亦指出了安特生的错误,使当地远古文化的年代序列得到更为圆满的解决。

[1] 安特生著、乐森瑛译:《甘肃考古记》,《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25年。

[2] M. Bylin-Altyin. "The site of chi chia ping and Lo Han Tang in kausu", BMFEA, No. 18, 1946.

[3] 安特生著、刘宽文译:《朱家寨遗址》, BMFEA, No. 17, 1945,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

[4] 安特生著、乐森瑛译:《甘肃考古记》,《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25年。

[5] 尹达:《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中国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1955年,第111页。

第二节 马家窑文化的命名

自马家窑文化发现以来,对其曾有不同的命名,至今也还没有完全统一。安特生曾将临洮马家窑与和政半山两处性质不同的史前遗存合在一起,认为都属仰韶期或仰韶文化;有时为了同河南省的仰韶文化遗存相区别,便称为“甘肃仰韶文化”。

1943年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及北大文科研究所联合组成了西北科学考察团。主要成员有夏鼐、李承三、周廷儒、向达、阎文儒。1944年3月至1945年3月,夏鼐和任职于兰州中国银行的吴良才一起对兰州附近的史前遗址进行了考察,包括高坪、中山林、太平沟、十里店、土门后山、曹家咀、青岗岔等遗址。其中十里店、土门后山、曹家咀均由西北师院何乐夫发现,并对十里店及曹家咀遗址进行过清理试掘。1941年11月卫聚贤也曾对曹家咀遗址进行过调查^[1]。1945年4月夏鼐到临洮调查史前遗址,于4月21日由临洮县城赴寺洼山调查发掘。发掘寺洼山的主要目的是明确寺洼期墓葬与马家窑期遗址的关系。夏鼐在发掘报告中指出:“这两区的时代及它们所代表的文化,概括地说,可算是相同的。至于A区中寺洼期墓葬,显然是较马家窑文化期为晚。这不但可由地层上来证明,并且就遗物而论,寺洼陶的陶土中夹杂着碾碎的旧陶片细末,有几粒较大的。可以很清楚看出是用马家窑式彩陶或红陶片来碾碎的。当时大概便是捡拾散在地面上的破陶片,碾碎了来做‘麝和料’和绳纹粗陶麝杂砂粒的用意相同。被利用的破陶片的时代,自然要比较寺洼期所制造的陶器为早。所以这也可用来证明二种文化的先后关系”^[2]。在结束寺洼山遗址的发掘工作后,夏鼐先生于1945年5月到广河县半山区调查,在阳洼湾发现了齐家期的墓地,在墓葬填土中发现仰韶期彩陶片,这一重要地层关系的发现对纠正安特生关于齐家早于仰韶的错误观点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下层的填土,却丝毫看不出有什么扰乱过的痕迹。就这两片彩陶的位置而言,如果是埋葬后墓上的土全部经过扰乱翻动以致这些彩陶片混入,那么墓中的人骨和彩陶片既这样挨近,也必定会被动乱的,但是我们却绝对地没有找出这些尸骨被动乱过的任何痕迹。因此我们断定这两片彩陶是由墓穴中未被扰乱过的下半部填土中出来的。这两片彩陶……就陶质及花纹而论,皆与标准型的仰韶文化彩陶无异。至于墓中的殉葬陶罐,皆属于标准型的齐家文化陶器”^[3]。

[1] 夏鼐、吴良才:《兰州附近的史前遗存》,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中国科学院,1951年,第66页。

[2] 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见梁思永、夏鼐编辑《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49年,第74~75页。

[3] 夏鼐:《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见李济编辑《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106~107页。

1945年6月,夏鼐和阎文儒又到甘肃河西走廊考察,在民勤县复查沙井文化遗址,在张掖发现了与沙井文化有关的黑水国遗址,为仰韶文化研究的继续深入提供了珍贵资料。

夏鼐先生从地层上证实了甘肃仰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纠正了安特生的错误,解决了考古学上的重大问题。这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新起点,也意味着外国学者主宰中国考古学的时代从此结束。通过对遗存的分析,夏鼐先生认为安特生所说的“甘肃仰韶文化”与河南的仰韶文化有颇多不同,提出:“我以为不若将临洮的马家窑遗址,作为代表,另定一名称”^[1]。

考古学文化,是指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多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的小地名来命名。由安特生命名的甘肃仰韶文化,其内涵以马家窑文化为主,其中主要的彩陶类型,基本都属于马家窑文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学界多数人主张把以青海民和马厂遗址为代表的另一类史前遗存,与马家窑、半山的遗存合在一起,统称为“马家窑文化”,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2]1961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正式把甘肃仰韶文化改名为马家窑文化,1982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和1984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等大型论著中都采用了这一名称,并且认为它是黄河上游地区最主要的一支新石器时代文化,其文化面貌既区别于甘、青地区诸远古文化,又不同于中原的仰韶文化。可以说,马家窑文化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三节 马家窑文化的普查与发掘

马家窑文化的发现迄今已有80余年历史。1949年以前,老一辈考古学家如裴文中、夏鼐、黄文弼、何乐夫先生等,在艰苦的条件下,开展了初步的工作,发现遗址多处,并搜集整理了不少资料,有些已发表了报告或论著,有开创之功。在他们的资料和成果基础之上,以后的几十年中马家窑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取得了更为重要的成就。

20世纪40年代,夏鼐先生调查兰州地区,发现了青岗岔半山类型等遗址^[3]。裴文中先生也调查了兰州附近及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发现马厂类型遗址多处^[4]。

1947年6月,中国地质调查所裴文中和米泰恒由兰州出发,到临洮、洮沙、广何及

[1] 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见梁思永、夏鼐编辑《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49年,第71页注释[2]。

[2] 也有学者认为,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是仰韶文化晚期的一支地方性遗存,当属于仰韶文化系统。张学正等:《谈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的分期和相互关系》中未使用“马家窑文化”这一名称。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中认为马家窑期属仰韶文化中的一个期,不同意用“马家窑文化”命名。

[3] 夏鼐、吴良才:《兰州附近的史前遗存》,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中国科学院,1951年,第66页。

[4] 裴文中:《中国西北甘肃走廊和青海地区的考古调查》,见《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64~267页。

临夏等县进行考古调查,共发现史前遗址23处。计有洮沙县的灰咀、裴家湾、辛店郭家庄、辛店东、辛店南、康家崖,临洮县的皇后沟、田家湾、王家坪、秦家堡、石咀北楞、董坪、齐家坪、店子街、寺洼山、马家窑(麻峪沟、瓦家坪)、五里铺、毛王庄、大石头,广河县的上三甲集、格子村,临夏县张家咀、崔家崖等。7月至天水,对渭河上游的天水、甘谷、武山及陇西等县进行调查,共发现史前遗址39处,计有天水县的七里墩、高家湾、跑马泉、花牛寨、罗家湾、陆军第一师公墓旁、老君庙、两山坪、四十里铺、六十里铺、关子镇、烟铺下、吴家庄西南、吴家庄南、吴家庄东北、张家湾,甘谷县城南二十里铺、三十里铺、梁家沟、何家沟、西四十里铺、西王庄、五甲庄,武山县的毛家坪、涧滩、孟家庄、石岭下、赵家坪,陇西县城东四十里铺、城西西河滩、三坪石、王家坪等。除七里墩、烟铺下曾被安特生助手调查外,其余均为首次发现。8月前往西汉水流域的成县、西和及礼县进行调查,共发现史前遗址24处,计有成县城内的紫金山,西和县的纸坊镇、青山坡、上城、空头山、陈家山、西峪坪、魏儿上、太山庙东坡、也池下、赵家坪,礼县的永兴镇公路旁、凌家庄、冯家崖、城西山、城北沟北、城南五里村、石壁下、石桥镇、白蛇坡、称家磨、辛家庄、高磨西南、高磨东北及定西城北等。这些遗址中部分属仰韶期文化且具有某些地域性特点。在兰州期间,由何乐夫为向导,复查十里店、西果园、青岗岔等由夏鼐、何乐夫、吴良才曾经调查过的遗址^[1]。

1948年由裴文中、贾兰坡、刘宪亭、王日伦、米泰恒及刘东生等组成调查队,赴甘肃、青海进行地质学和考古学考察,目的是继续裴文中先生前一年的未竟工作。考察工作自5月开始到10月结束,对甘肃的河西走廊、青海的湟水流域及青海湖一带做了大量的工作,收获颇丰。在永登县发现5处史前遗址,其中3处均位于县城东南2公里的马兰阶地上,出土石器、陶器,但无彩陶,裴文中先生判断为辛店期或沙井期。另外2处在长城沿线,对其中的一处做了小规模发掘,出土有不典型的石片,兔、羊、鹿等兽骨及仰韶式和马厂式彩陶片。从全部出土物来看,裴文中先生认为这里应是“彩陶文化从仰韶发展到马厂阶段的中心。此外,一些仰韶式的陶器与洮河和渭河上游相似,不过仅在图案上表现了一定的地方性。这表示仰韶时期这一地区同洮河、渭河上游的密切联系”^[2],考察队在武威县城西南海藏寺的西侧发现一处包含细石器和陶片的遗址。打制的细石器和三角形石镞是典型的蒙古式的细石器,陶器中有安佛拉罐及仰韶马厂式的彩陶片,还有猪、羊和鹿的骨骼。这种现象裴文中先生认为是“当齐家文化向北扩展到武威地区,同从蒙古来的细石器文化以及由仰韶向马厂过渡的衰退彩陶文化相遇”所形成的^[3]。裴文中先生等在民勤县考察了早年安特生调查试掘过的三

[1] 裴文中:《甘肃史前考古报告》,《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08~218页。

[2] 裴文中:《中国西北甘肃走廊和青海地区的考古调查》,见《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58页。

[3] 裴文中:《中国西北甘肃走廊和青海地区的考古调查》,见《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58页。

角城、柳湖屯、沙井及黄蒿井等遗址，在永昌县发现并试掘了高庙遗址，在张掖西北黑河西岸复查了黑水国遗址。早年斯文赫丁探险队的布林(B.Bohlin)曾在酒泉附近采集过史前彩陶，但没有报告发表，据安特生研究其彩陶可能属于马厂期，但裴文中先生这次在酒泉考察不曾发现。民勤、张掖、永昌发现的9处遗址，裴文中先生认为是“代表了一群的特殊文化——沙井文化，它是彩陶的后裔，并在这个蒙古沙漠的边缘上，一直延续到青铜器时代”^[1]。考察队裴文中一行在兰州城南龙首山发现齐家、马厂陶器的遗址1处，在这里收购了一些陶器。裴文中先生认为从购买的全部陶器上来考虑，这个地点表现了齐家、马厂和仰韶的混合特征。“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解释：1. 从大夏河地区传来的齐家文化，曾在兰州地区与退化的仰韶文化相遇；2. 马厂是从仰韶发展而来的，器形仍属仰韶，而纹饰已进入马厂时期。从这个地点的发现，促使我们相信甘肃彩陶文化的发展，是从仰韶到马厂”^[2]。裴文中和王日伦还在湟水下游调查和复查了王家沟子、海石湾、窑街、马厂塬及韩家庄等遗址，在中上游调查和复查了小桥、朱家寨、塔尔寺东北、海宴三角城及湟源西新庄等遗址。这些遗址除个别为齐家、辛店期外，多数属马厂期文化遗存。上述中国地质调查所考察队对甘肃河西走廊及青海湟水流域等的考古调查成果，是继1947年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工作，为研究这一带的史前文化积累了大量珍贵资料。

1937~1949年之间，战争严重影响了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大规模的田野发掘无法进行，对重要地区和重要遗址的工作不能展开，所以对马家窑文化的田野考古工作是很有限的。20世纪50年代，文物考古单位为配合包兰铁路、天兰铁路等国家基本建设，在甘青地区做了大量的考古普查工作。在调查的同时，选择部分遗址进行试掘，以探明各遗址文化层的堆积情况与文化内涵。1953~1955年，兰州白道沟坪遗址清理马厂类型陶窑12座，墓葬24座，出土陶器等遗物351件^[3]。1956年，对刘家峡水库区考古调查，发现马家窑文化遗址47处^[4]；同年，皋兰县糜地岷遗址清理马厂类型墓葬7座^[5]。1956~1958年间，对渭河及其支流南河、榜沙河、漳河等流域，包括天水、甘谷、武山、渭源、陇西等县市考古调查，发现马家窑文化遗址62处^[6]。1957年，洮河流

[1] 裴文中：《中国西北甘肃走廊和青海地区的考古调查》，见《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59页。

[2] 裴文中：《中国西北甘肃走廊和青海地区的考古调查》，见《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65页。

[3] 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兰州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第5~7页。

[4] 安志敏：《甘肃远古文化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考古通讯》1956年第6期，第11页。

[5] 陈贤儒、郭德勇：《甘肃皋兰糜地岷新石器时代墓葬清理记》，《考古通讯》1957年第6期，第7页。

[6] 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渭水上游天水、甘谷两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5期，第1页。《甘肃渭河上游渭源、陇西、武山三县考古调查》，《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第7页。《甘肃省渭河支流南河、榜沙河、漳河考古调查》，《考古》1959年第7期，第326~327页。

域调查,发现马家窑文化遗址12处^[1]。1958年,西汉水流域调查,发现马家窑文化遗址17处^[2];同年,在湟水流域的民和、乐都、西宁、湟中等地调查^[3]。1957年,在临洮马家窑—瓦家坪遗址发现马家窑文化叠压在仰韶中期文化庙底沟类型之上的地层关系。同年,渭源县寺坪遗址发现齐家文化叠压在马家窑文化上的层位关系。1959年,在黄河上游盐锅峡、八盘峡、寺沟峡等水库区内的永靖、临夏等县普查,发现马家窑文化遗址21处^[4]。先后发表的报告有:《渭河上游天水、甘谷两县考古调查简报》^[5]、《甘肃渭河上游渭源、陇西、武山三县考古调查》^[6]、《甘肃临洮、临夏两县考古调查简报》^[7]、《刘家峡地区的考古调查》^[8]、《黄河上游盐锅峡与八盘峡考古调查》^[9]、《兰州市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10]。

安志敏先生还于1956年6月23日应邀在甘肃省博物馆作了《甘肃远古文化及其有关的问题》^[11]的演讲,期间曾到山丹四坝滩进行调查,发现四坝遗址中甲、乙、丙三组文化遗存,其中的甲组属马家窑文化,这就把马家窑文化遗址的分布范围向西延伸到了河西走廊^[12]。可见,20世纪50年代,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所作的考古调查,主要是基本搞清了各种文化在甘肃的分布状况。到1960年,甘肃省博物馆发表《甘肃古文化遗存》^[13],公布马家窑文化遗址达157处。同时发现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东部的渭水上游、西汉水流域及泾水流域,而马家窑文化则主要分布在洮河、大夏河流域和永靖、兰州附近的黄河沿岸。在东部地区的部分仰韶文化的遗址内发现含有马家窑文化的轻微的混杂成分,在与洮河流域相毗邻的西部地区的仰韶文化遗址内,马家窑文化的成分逐渐增多,而且逐渐发现了单纯的马家窑文化。这说明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实际上是单独的两个文化系统,并且在时间上可能有先后关系。

这一阶段的考古调查收获还在于初步搞清了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的相对年代。(1)在天水西山坪,发现齐家文化的灰层叠压在仰韶文化的灰层之上;在天

[1] 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甘肃临洮、临夏两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9期,第36页。

[2] 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甘肃西汉水流域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59年第3期,第138页。

[3] 安志敏:《青海的古代文化》,《考古》1959年第7期,第376页。

[4] 黄河水库考古队甘肃分队:《黄河上游盐锅峡与八盘峡考古调查记》,《考古》1965年第7期,第321页。甘肃省博物馆:《黄河寺沟峡水库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第7页。

[5] 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渭水上游天水、甘谷两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5期,第1~5页。

[6] 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甘肃渭河上游渭源、陇西、武山三县考古调查》,《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第6~16页。

[7] 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甘肃临洮、临夏两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9期,第36~49页。

[8] 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刘家峡地区的考古调查》,《考古通讯》1956年第5期,第42~43页。

[9] 黄河水库考古队甘肃分队:《黄河上游盐锅峡与八盘峡考古调查》,《考古》1965年第7期,第321~325页。

[10] 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兰州市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59年第7期,第323~345页。

[11] 安志敏:《甘肃远古文化及其有关的问题》,《考古通讯》1956年第6期,第9~19页。

[12] 安志敏:《甘肃山丹四坝滩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第7~14页。

[13]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古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第12页。

水柴家坪南部齐家文化遗存的灰层中,发现了少量仰韶文化的遗物;在天水七里墩遗址齐家文化的墓葬填土中,发现少许仰韶文化的尖底瓶碎片。这就说明,仰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2)在渭源寺坪遗址中,发现仰韶文化和齐家文化共存,后者叠压在前者之上。又有两个齐家文化的灰坑,打破了仰韶文化的灰层堆积。这也证明了二者的先后关系。(3)在临洮马家窑瓦家坪遗址中,发现了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三者依次叠压的地层关系。(4)在永靖刘未庄发现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相混杂的地层上面,叠压着齐家文化的白灰面,白灰面上层为纯粹的齐家文化。这些发现,为甘肃新石器时代仰韶→马家窑→齐家诸文化的相对年代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以更加充分的事实材料驳斥了安特生“六期说”中齐家→仰韶→马厂的错误排列。但是,20世纪50年代的工作,主要限于地面上的调查采集,系统的规模较大的科学发掘尚未开始。

1960年9月22日至11月22日,黄河水库考古队发掘了临夏马家湾遗址,清理房基7座、窖穴5个,出土石、骨、陶等生产生活用具33件。1961年发表《甘肃临夏马家湾遗址发掘简报》^[1],后于1975年发表了这次发掘的全部材料《甘肃永靖马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马家湾属于马厂类型,在马厂类型遗址发现房子还是第一次,这就否定了安特生所谓马厂类型只有葬地没有住地的说法^[2]。1962年,甘肃省博物馆在武山石岭下遗址进行复查时,在典型的马家窑类型地层之下,发现还有一层文化面貌更接近于庙底沟类型的文化遗存。1976年,《从马家窑类型驳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化西来说”》^[3]一文,首次提出“石岭下类型”这一新的文化名称。并据此分析了马家窑晚于庙底沟,庙底沟通过石岭下发展为马家窑的前后因袭关系。可见,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原仰韶文化与马家窑文化的相互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1963年10月23日至11月5日,发掘兰州青岗岔遗址,发表《甘肃兰州青岗岔遗址试掘简报》^[4],主要收获是发现了半山类型的房子1座。1966年9月,甘肃省博物馆又在兰州市王保保城址内清理马家窑类型墓葬1座,报告有《兰州马家窑和马厂类型墓葬清理简报》^[5]。这两处遗址的发现,纠正了安特生过去所谓“半山葬地说”和“马家窑住地说”的谬论。事实证明,马家窑不仅有住地,也有葬地;而半山不仅有葬地,也有住地。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为填补某些地区的考古空白点组织调查工作,并为讨论某些学术问题,对有代表性的遗址进行发掘。1973年,发掘广河县地巴坪墓地,发现半山

[1] 黄河水库考古队甘肃分队:《甘肃临夏马家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11期,第609~610页。

[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马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75年第2期,第96页。

[3] 甘肃省博物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连城考古发掘队:《从马家窑类型驳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文物》1976年第3期,第26页。

[4]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兰州青岗岔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3期,第27页。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兰州青岗岔半山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集刊(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7页。

[5]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兰州马家窑和马厂类型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75年第6期,第76页。